

■新作聚焦 王安忆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

世上或有不散的筵席

□刘欣玥

在《长恨歌》里,王安忆描写革命年代炉边小天地“围炉夜话”,是读者最津津乐道的章节之一。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但时局似乎与弄堂里的王琦瑶们无关,她们在炒瓜子、剥栗子、烤鱼干、涮羊肉中获得肚腹间的暖意和体己温情。在政治动荡的岁月里,市民生活中的饮食闲谈,在“世界的边角上,缝隙里”展示出日常生活的强大意志。对于这种“从容不迫的三餐一宿”的欣赏,也揭示出王安忆的饮食书写关于“日常”与“大历史”的辩证机心:柴米油盐承载着日常生活难以被大历史撼动的恒定性,却又始终深深扎根于大历史。换句话说,离开了具体的历史和历史中人,也就无法理解王安忆笔下的一蔬一饭的复杂和独特所在。在《向西,向西,向南》中,王安忆开始思考中国菜与中国人漂泊海外的命运。两个曾有一面之缘的中年女人,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中国餐馆重逢。精细清淡的江南味,在遍地左宗菜鸡、甜酸酱的西式快餐市场中无法存活,但在至暗时刻,原乡的滋味仍有抵抗离散、重新整顿人生的力量。

王安忆最新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讲述淮扬菜厨陈诚的一生。题目中的“一把刀”是“扬州三把刀”中讲究刀工精细的菜刀,“千个字”则取自袁枚《随园诗话》中对扬州个园竹趣的吟咏,“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陈诚少时阴差阳错地入行肆厨,从此“薄技在身,走遍天下”,从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他的人生开蒙从绣像本《红楼梦》、黄历、劳动与朴素热烈的草莽民间而来。经由一个人在历史中的成长,“刀”与“字”之间的张力,也打通了庖厨与刀笔两个不同的启蒙世界、两种不同的立世选择。

需要首先指出,尽管别出心裁地选择以“淮扬菜”为话头,《一把刀,千个字》却绝对不是一部书写“技艺”“工匠”的长篇作品。这里面没有《天香》中为顾绣著书立传的案头考据工作,也不同于《考工记》中对老宅、建筑物、木工工艺的客观雕琢。尽管小说中不乏动人的饮食场景与精彩议论,终究指向的还是“人”。王安忆借物起兴,反观人情。南橘北枳,食材的“物性”会随水土转移发生必然的变化,那么“人性”“人心”也会变吗?扬帮菜从“乡下人的乡下菜”走向五方杂处的上海滩,再进军大洋彼岸,早已背离本宗远矣。但是,与其说小说家关心的是“味”的偏离乃至堕落,不如说,是要讲述一个“知味的人”消失的故事。“珍馐佳肴落脚于劳役的果腹,好比那一句古诗:‘昔日王侯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上海滩“包饭作”的昔日传说之所以格外吸引王

安忆,是它背后的平民百姓精神和劳动日常美学。至于反复念叨“好东西是吃出来的……礼失求诸野,如今,连‘野’都沦落了”,皆因王安忆所忧虑的,是这种大众精神的失落。

小说上部从陈诚在纽约法拉盛的中年人生写起。这块看似“没有民族国家大义”的新兴侨埠,实则隐藏着各路人物和他们决心物断的前尘往事,改名换姓的陈诚也是其中的一员。陈诚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祖籍淮扬,生于哈尔滨,长于上海虹口弄堂,学成于高邮西北乡与沪上名家,随改革开放后的出国大潮移居美国,在旧金山唐人街打过黑工,又在特殊历史际遇下安家纽约。当然,“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流徙与“不知道自己是谁人”的无根性,只是主人公履历的一种讲法。随着小说中各色人物登场,现实与回忆往复成网,陈诚背后破碎的四口之家逐渐浮出水面:到晚年仍信仰革命所以不免显得落伍的父亲,跻身美国精英阶层的为人锋利的姐姐,温驯沉默远离人群的自己,还有缺位的母亲,在巨大的悬念下,迟迟没有露出庐山真容。就如同小说中多次写到的那张从家庭相簿中被抽走的全家福,只留下一片历史的空茫。

进入小说下半部,王安忆陡然扭转时空坐标,从西向东、从南到北,重返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东北哈尔滨,交待母亲短暂却传奇的一生。这个全家碰不得、说不出的陈年疮疤才得以揭开。当年母亲出事后,年幼的陈诚被连夜送往上海姑母家,在远离风暴、寄人篱下的岁月里,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母亲的记忆。直到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与宣传作品,让一个陌生的、被符号化、圣像化的



《一把刀,千个字》插图



王安忆最新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讲述淮扬菜厨陈诚的一生。经由一个人在历史中的成长,“刀”与“字”之间的张力,也打通了庖厨与刀笔两个不同的启蒙世界,两种不同的立世选择。

母亲形象强势回归。“烈士遗孀”、“英雄少年”的新身份,被遽然改写的命运,连同着裹挟一切的集体新生活,都令他无所适从。这些都为后来的远走埋下伏笔。

至此,读者已经知晓了法拉盛名厨另一重不为人知的身份:他是烈士之子,是革命乌托邦与暴力劫难的后来人,也是完身穿过历史剧烈错位的幸存者。但陈诚的人生还要继续。这也是王安忆最想要追问的问题:大开大合的历

史潮水褪去后,他要如何面对母亲的幽灵,消化家人挥之不去的悲哀、懊悔与怨恨,与“不像母亲的儿子”的责难和解,并在新大陆上重生为一个真正的自己?

在《一把刀,千个字》里,王安忆以热眼看向激进年代的深处,转过身去,认真记录下一桌又一桌难忘的饭菜。小时候与爷叔、招娣在钢铁厂职工食堂吃过的最像一家三口的一顿饭,最平凡的上海家常菜,令陈诚一生对那个钢火世界里的温乡魂牵梦萦。在扬州老家与玩伴分食咸鸭蛋、螺蛳和软兜豆腐羹,充满了童趣的吃法中也蕴含着物质紧张年代的惜物之心。“仿佛一线游丝,连接本乡”的软兜(即鳊鱼)更成为陈诚后来在美国遍寻而不得的乡愁。而到了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林场,又变成了东北火炕上热气腾腾的大锅炖煮和热炒,年轻的朋友挤在一起,也滋养了姐弟俩在后知青时代最后的青春美梦。

饭菜的背后,是无限细腻的“生计”和有情的“结识”,毫无疑问,这是王安忆最为擅长的烘烘的人间烟火气。无论是这些至情、至性、至味的吃饭场面本身,还是作家的笔力,都是动人的。主人公在这流水的人生筵席中,从自己的小家脱落,进入广阔天地,更内化了天南地北的风物、味道和手艺。“广纳博取,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小说中对“上海就是个滩”的判语,又何尝不是在描述陈诚呢?那些下沉铺底于革命年代的人间记

(上接第1版《鲁迅文学院建院7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鲁迅文学院教师导师代表白桦、教职工代表蒋同、学员代表柳建伟和李浩在会上先后发言,介绍了各自在鲁迅文学院的教學情况、工作和学习经历,畅谈了对鲁院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認識,表达了对鲁院的真摯感情和美好祝願。白桦表示,鲁院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人才摇篮,在各类培训班齐头并举的同时,鲁院重点做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选人与培训,为文学事业的更大发展储备和提供优秀的人才队伍。新时代的鲁院大有可为。蒋同谈到,在建院70周年之际,我们欣喜地看到鲁院与时俱进、蓬勃开放的现在进行时和新貌层出、风姿卓然的文学景观。多年来,一代代鲁院教職員工堅

持以学员为本,不断探索符合学员需求的教学方式,形成了鲁院风格的优良传统。柳建伟20多年来曾先后四次进入鲁院学习深造,在他看来,鲁院对自己人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这里不仅完成了一个作家知识体系的基本建构,也在一次次充电后坚定了继续在文学道路上奋进的信心。李浩说,鲁院对作家尤其是新生代作家的培育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鲁院聆听的课程和从老师、同学们那里得到的启发与批评带来多方面的教益,让自己深受惠泽,并且会一直延续。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负责同志,鲁迅文学院新老教職員工代表、教师导师代表、学员代表,各地文学院代表等。

(上接第1版《深情回望,奔赴新征程》)把根扎在人民中间,和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表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梦想,反映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鼓舞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这就是我们的初心、我们的使命所在。鲁迅文学院要更加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广大作家的头脑,认清时代的主流和方向,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自觉承担起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创作弘扬中国精神、传递中国价值、展现中国力量的优秀作品。

希望鲁迅文学院坚持守正创新、矢志不渝地为人民培养更多优秀作家,推动产生更多精品力作。一所致力于文学教育的学院,衡量它的成就和价值,归根到底要看它培养了多少人才,要看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交出了多少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鲁迅文学院以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就是要传承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光荣传统,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推动文学的观念变革和艺术创新,激励作家笃定恒心,大胆探索,勇攀艺术高峰。鲁院的标尺应该是高的,就是要培养优秀作家,就是应该作为作家们攀登高峰路途上思想和艺术上的向导,成为补给站、加油站。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鲁院不能有丝毫懈怠,应当永远在路上,永远先行一程,向着新时代思想和艺术的高地、前沿奋发力。期待鲁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懈探

索创新,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主动地引领文学潮流。

希望鲁迅文学院坚持风清气正、立德树人,把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艺术理想作为人才培养的第一要务。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笔尖下生万物,笔下有天地’。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养,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总书记的话,体现着社会主义文学教育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时刻铭记,切实贯彻到鲁院工作的所有环节中。

鲁迅文学院和全国各级文联作协领导下的文学院,是繁荣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力量。我相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大家一定能够不负重托,培养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作家,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文系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2020年11月20日在鲁迅文学院建院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短评

以本土本事完整呈现现代中国

——读《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 □樊迎春

张莉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全面梳理和考察“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之本事。对起源的探讨总是以“发生学”的美名,以无穷的魅力诱惑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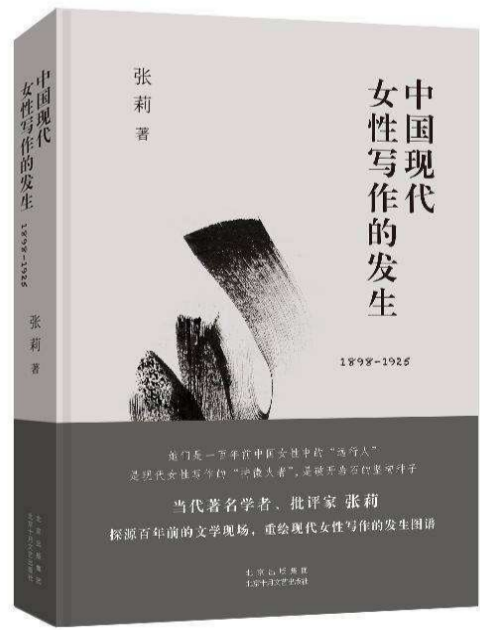
正如王富仁先生在序言中所说,“要是没有西方文化的‘压迫’,中国的文人不会提什么‘女性问题’,但张莉在绪言中开宗明义,本研究‘不是时下女性文学研究中通用的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作者立意于关注‘中国环境’,梳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女作家的教育史、生活史以及写作史。在这样的意识基础上提出‘女学生文学’的概念,确切地说,是关注到‘女学生’这一之前并未引起多少注意的群体,捕捉这一群体对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重要作用。通过对这一群体起源的考察,作者成功抵达了现代女性写作的起点。尽管王富仁认为张莉观察的女学生群体所在的学校教育空间中,‘家国同构的社会关系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男女两性的关系不是在家庭经济关系和国家政治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真正意义上的男女两性的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显然这一空间并没有王富仁所勾画的那样成为理想的飞地,张莉依然在多重维度上论述了历史、国族、家庭、社会等对男女两性关系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甚至可以说,‘女学生’所在的教育空间只是这些维度交错运行生发作用的原因与结果,当然,也是这一空间直接孕育了现代女性写作。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支撑自己的叙述逻辑,并纠正了以往现代历史上对女性解放的诸多误解。如以往认为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也都是以民族问题为前提,张莉认为要区分1898—1918和1918—1925等不同时期妇女解放的不同内涵,即晚清民初的‘强国强种,贤妻良母’式妇女解放与进入‘五四’时间之后作为‘人’的妇女解放。正是在这种不同时期解放性质的重大区别中第一代女性作家成长起来。也正如‘妇女解放:一个问题的两种看法’一节所梳理的金一与何震的巨大观念差异,也是在‘主流’与‘偏离主流’的观念博弈中,真正意义上的、男性话语之外的、功利性之外的、作为单独个体存在的女性及女性话语受到了文坛与社会的注意,陈衡哲、冰心、凌淑华、庐隐、冯沅君等作家才走出家门,走进校门,走上文坛。张莉在这样的意义上建构起个人的学术框架与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梳理总结了

这一代女作家的风格特征与时代意义,填补了理论之外的材料空白,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寻找到了真实而具体的起点,开启了更为宏大艰难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发生的学术讨论。

这部著作直面了性别研究永恒的难题,即“女作家”何以成为问题?更普遍地讲,“女性”何以成为问题?作者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有对当时批评家观念的总结,“因为女子的内心生活和社会生活究竟和男子不同;她们所描写的对象,每为男子所难想象到。所以,她们的生活实在可以代表另一种为男子十分隔阂的生活”,也给出了自己对女性写作价值的评价,“她们对于语言形式的探索”,“对‘问题小说’写作的开拓性工作”,“对于儿童文学的贡献”,但显然,前者依然是“男子”话语权之下的表态,而后者则停留在单纯的文学技术层面,甚至是男性作家也可以做得到的贡献。这里当然不是质疑张莉对女性写作发生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是要进一步追问,当起源与发生的难题都得以梳理和解决的时候,该如何为问题本身寻找正义性?张莉在书中也给出了“社会性别”的视角,试图进入历史情境,采取“共时”的讲述,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以此观察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问题,显然有利于性别关系研究的深入和性别平等的推进,但“女性”的特殊性与独特性意义依然没有凸显。

即便是有意回避西方的性别研究理论,我们依然不能忽视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和性别问题的世界背景。如果说是西方文化的压迫促使我们“发现女性”,那么也必须承认西方的现代性进程对中国现代的“入侵”,换句话说,“现代中国文学”也正是“现代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对“女性”乃至“女性写作”的关注是西方影响的结果,更是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主动选择,没有“妇女”的发现,就没有现代社会要求的基本的平等、文明、和谐。换句话说,“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本身也意味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现代中国文学进程的“完整”“发生”。“发生”由此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能指,“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成为这一能指立足落脚的具体所在。

张莉所研究的“冰心女士”的接受史恰好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另一种现实解释。冰心和同时期的作家们相比,在读者和批评家那里更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冰心的创作理念中既有传



统的对女性身份的认知和审美,如对贤妻良母的颂扬,也具有现代的反抗和进步因素,如对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这使得冰心的创作历程更像是传统与现代碰撞之下的结合,这种并不极端激烈的立场似乎更适合一切悬而未决的现代中国时代的读者们。冰心有着社会性别视野下的人文关怀,却也始终携带着性别偏颇的传统阴影,这可能也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时期的典型问题,或者说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典型问题。女性写作本身正如冰心的创作立场,有可以完整“现代”的素质,却也沾染某种暧昧,这种暧昧包括自身存在的合理、合法性,也包括其在不同时间受到的阐释与质疑,更包括其本身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残缺。然而,这种暧昧恰恰也是“现代”“发生”的标志与产物。“女性写作的发生”正是荒烟蔓草的时代里挣扎求存的人们对石头和木头的使用,文学参与者由此“完整”了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而中国文学也“完整”了自身的“现代”属性。规避了西方时髦理论,立足本土本事的《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在这样的意义上不容忽视。